

中国初期金铜佛及其来源[※]

●何志国

摘要：中国初期金铜佛是胡人面容，基本特点是睁眼、上唇有八字胡，与长江流域西晋纪年魂瓶佛像和吴晋陶瓷佛像相似。其图像志主要来源于汉晋时期佛像，部分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近年刊布的西晋“太康十年”铭文铜佛是参照某些南北朝早期金铜佛像特征的赝品。

关键词：初期金铜佛 特点 辨伪 起源

文章编号：1003-2568(2009)04-0082-06

中图分类号：K879.4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何志国，江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邮编 212013

初期金铜佛是中国早期金铜佛中的最早者，它不仅对中国金铜佛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风格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初期金铜佛的年代至今聚讼未决，众说纷纭。近年来，甚至有假冒中国最早纪年金铜佛发表在专业杂志上（详见本文第二节）。过去，有学者论及初期金铜佛的来源，只提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至今未有人对中国初期金铜佛及其来源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专就中国初期金铜佛特点、年代考证、辨伪、来源，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敬请方家教正。

一、中国初期金铜佛特点

现存中国初期金铜佛有以下六尊。

1.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传河北石家庄出土。高 32.9 厘米。肉髻呈覆钵状，中空，为四方形，发络中分，呈水波形，额中凸起白毫相，双眼较长，睁眼，上唇有口髭（俗称八

字胡）；双肩各生有四枚锯齿状火焰纹，穿通肩袈裟，圆领左宽右窄，从左肩向右撒出均匀、呈抛物线状衣纹，两臂衣纹细密，双手相叠，掌心向上，大指相抵，放于腹前；衣角从两手腕自然下垂，衣角末端呈菱形，手下衣纹也

从左向右撒出，呈抛物线、不规则的弧形。衣纹贴体，具有透视感。佛座为方座，座前面两侧分立正面浮雕立狮，狮子垂耳，张口露齿，毛发可见，略向外倾斜站立，中间为浮雕一瓶，插两束莲花。（以下简称福格坐佛）（图 1）

2. 日本私人收藏，据称在中国北方发现。高 20 厘米。束发肉髻，双眼较长，睁眼，上唇



图 1 美国福格博物馆铜坐佛

※A.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汉晋佛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批准号 09BKG008）系列论文之一。B. 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项目 编号 JDR2006A05。C. 江苏大学美术学和设计艺术学创新团队成果。

A. 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考古》1995 年 5 期 451-465 页。B. 李静杰《金铜佛的文献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 1 期 51-57 页。C. 金申《佛教美术丛考》，1-7 页，“十六国时期的铜佛像”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D. 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第五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海外遗珍》佛像（二）2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5 年出版二刷。



图2 日本私人收藏无畏印铜坐佛

有口髭;穿通肩袈裟,圆领,胸前呈上小下大的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双手之间形成一个较长的U形衣纹,衣袖衣纹细密。头后有圆形项光,项光内有数处盛开的莲花纹。(以下简称无畏印坐佛)(图2)



图3 日本藤井友邻馆收藏铜菩萨像



图4 故宫收藏铜立菩萨像

3. 日本藤井有邻馆(传陕西三原出土)和北京故宫收藏的金铜弥勒菩萨,均为立像。头发中间系带,发髻高耸,头发在前额从中间向两边分,头后余发披至双肩,双眼较长,上唇有口髭,上半身裸露,胸前挂两重项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净瓶,肩披帔帛,绕经手臂下垂,下半身穿裙,该像衣角处理写实,具体表现在,右侧披帛和裙形成两层重叠的U形衣纹,左侧衣角沿经左手腕后下垂,由于左手贴腰形成斜面,故左手腕上形成自然堆积的细密衣纹,下垂的衣摆形成的菱形,形成衣摆的自然褶皱,从而增加了衣纹的体积感。(以下分别简称藤井菩萨和故宫菩萨)两者的差别是,藤井菩萨高32.9厘米,足穿凉鞋,故宫菩萨高17.5厘米,足残。(图3、4)

4. 1902—190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和田纽特干遗址采集两件青铜佛头,以下编号为青铜佛头A、B分别叙述。

青铜佛头A,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高17厘米,宽12厘米,高肉髻,髻底系二带,宽额,额中镌刻象征白毫的九曜纹,大眼圆睁,鼻梁端正,转折棱角清晰,双唇紧闭,上唇有



图5 和田出土铜佛头



图6 和田出土铜佛头

口髭,面容清癯。(图5)沈俐将其定为十六国初期(3—4世纪)。村田靖子则定为4世纪。

青铜佛头B,高13厘米,高肉髻,髻底系一带,额有向上梳的发迹,头附残存项光,大眼圆睁,鼻梁挺直,面庞圆润,双唇紧闭,上唇有口髭。(图6)村田靖子定为3—5世纪。

上述六尊佛像的共同特点是,睁眼,上唇有八字胡,大体上为胡人造型,他们显示了相同的时代风格。

[日]村田靖子著,金申译《佛像的系谱》,109页,93页,9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A、日本藤井有邻馆收藏的金铜弥勒菩萨见[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艺术寻踪》,247页图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B、北京故宫收藏的金铜弥勒菩萨见李静杰、田军主编《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73页图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121页,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

二、中国初期金铜佛年代考证及“太康佛”辨伪

学术界对上述六尊金铜佛的年代莫衷一是，甚至同一尊佛像年代判断早晚相差近百年。李静杰把藤井菩萨、故宫菩萨、福格坐佛和无畏印坐佛的年代推定为西晋前后，金申把藤井菩萨年代定为十六国时期，把福格坐佛年代定为公元350年前后。丁明夷把藤井菩萨年代定为十六国末或北朝初期，日本松原三郎把福格坐佛和无畏印坐佛的年代定为三世纪。宫治昭认为福格坐佛的年代是四世纪前半叶，把藤井菩萨、故宫菩萨定为三世纪左右。也有人认为福格坐佛的年代是四世纪前后。沈俐将藤井菩萨年代定为十六国时期（4世纪）。

上述年代判定多为主观推断，并未详加分析。我认为，可以通过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尤其是有确切纪年和年代可考的佛像加以比较，可以求得上述佛像的年代。

这六尊金铜佛睁眼的特点与魂瓶西晋纪年佛像相似。近年来在江南一带发现的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到元康元年（290年）的陶瓷佛像，其特征是：佛呈坐姿，睁眼，头后有圆形项光，头作螺髻或大肉髻，穿圆领或尖领通肩袈裟，胸腹前衣纹呈密集的圆弧形，施禅定印，座下有两层覆莲，佛两侧有狮头。与此相似，福格坐佛座下两侧也有狮子。两相比较，福格坐佛的狮子要清晰、完整一些。另外，这六尊金铜佛上唇均有八字胡的特点，与鄂州出土和故宫收藏的东吴至西晋时期釉陶佛

像相似。本文第三节将从初期金铜佛来源的角度探讨上述六尊金铜佛与汉晋佛像诸多相似之处，证明它们具有早期佛像特点。

中国现存最早有纪年的早期金铜佛是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文铜坐佛，它可以作为划定

上述六尊金铜佛年代下限的依据。该佛像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高39.7厘米，束发肉髻，双眼细长，穿通肩袈裟，圆领较窄，胸前略呈上小下大的U形衣纹，双手贴腹，衣角从两肘搭过，均匀覆于双腿之上，方座，边缘有阴线雕刻的云气纹。方座背后有铭文：“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以下简称建武坐佛）（图7）建武坐佛眼睛细长、上唇无八字胡的特点，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可以说，在东晋（约338年）以后，佛像睁眼的特征被细长眼所取代，上唇的八字胡也消失了。^①事实上，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铜佛，已经罕见睁眼、上唇有八字胡的特征。

因此，上述六尊金铜佛的年代订为西晋时期即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为妥。



图7 后赵建武四年金铜坐佛

李静杰、田军主编《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73页，282-28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金申《佛教美术丛考》6页，“十六国时期的铜佛像”，89页，“燃肩佛和佛发中的舍利、髻珠”，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文物》1984年5期，35页。

〔日〕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1995年。

〔日〕宫治昭著 李萍译《键陀罗艺术寻踪》，193页，215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海外遗珍》佛像（二），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5年出版二刷。

林中主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121页，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

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79、80、87、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A、湖北省考古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11期，1-24页。B、北京故宫收藏的金铜菩萨见李静杰、田军主编《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20页图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A、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B、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海外遗珍》佛像（二），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5年出版二刷。

①宿白也认为福格坐佛和无畏印坐佛的年代较建武坐佛为早。见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文物》2004年10期，68页。



图8 伪太康十年铜佛

但是,最近,有人刊布一件声称西晋“太康十年”(289年)铭文铜佛像,(图8)认为该像“比十六国之后赵建武四年(338年)提早49年”,成为现存最早有纪年的佛像(以下简称“太康佛”)。但是,这尊“太康佛”非常可疑。该佛为坐

像,头作束发肉髻,穿通肩袈裟,宽圆领有四道褶纹,胸前U形衣纹,衣角纹路宽大、细密,从两肘搭过,覆于双腿之上,施禅定印,手下衣纹呈纵向弯曲,佛头后为桃形项光,项光外是边缘为火焰状的桃形背屏,火焰纹透空,背屏和项光中有7尊小佛像,背屏有一牛头人身蹲于莲台之上。佛像坐于长方形四足台座上,佛座下有一排卷草纹。

显然,仅从项光、发式、衣纹等图像特征判断,这尊“太康佛”与西晋魂瓶纪年佛像和上述西晋金铜佛风格相差太大。乍一看,“太康佛”似乎具有南北朝早期金铜佛像的特点,从佛像形象、衣纹、手式观察,与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像与和平五年(464)□姜造坐佛有些相似,桃形背屏与韩谦造元嘉十四年(437)造像也有些类似,但后者的火焰状边缘并未透空,具有透空火焰状边缘的背屏到北魏皇兴四年(470年)王钟造观世音像才发现,但其形状与“太康佛”的背屏并不相同。

至于“太康佛”背屏的“牛头人身”更是在早期金铜佛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该像还有不少可疑之处,但从上述分析,就足以表明“太康佛”是参照某些南北朝早期金铜佛像特征、仿制技术并不高明的赝品。

三、中国初期金铜佛的来源

一般认为,中国初期金铜佛受到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宫治昭指出:“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4世纪至5世纪中期),中国初期金铜佛的容貌和衣纹表现,还保留着犍陀罗美术的影响……。中国佛教美术中,直接受犍陀罗影响的是5世纪初之前的作品。”李静杰也认为,“犍陀罗艺术对我国早期金铜佛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从宏观而言,此说并无大错。但是,我国已经发现为数不少的汉晋佛像,为探讨初期金铜佛的来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面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条件。以下从发式、头部特征、手印、衣纹和坐式几方面,把汉晋佛像与初期金铜佛进行对比分析。

1. 发式和头部特征。初期金铜佛的肉髻较大,与鄂州和故宫收藏的三国至西晋时期釉陶佛像肉髻相似,只是后者肉髻有些模糊;不过,佛像的大肉髻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是东汉中期至蜀汉时期的摇钱树上佛像的特点,新疆青铜佛头B磨光肉髻、肉髻之下可见纵向的发际的特点也与摇钱树干佛像非常相似。建武坐佛、无畏印坐佛为圆形项光,该特点在鄂州三国时期铜镜佛像和南京凤凰二年(273)魂瓶佛像也有发现,还可上溯至四川安县东汉中期摇钱树枝佛像。另外,无畏印坐佛项光内有数处盛开的莲花纹,在安县东汉中期摇钱树干佛像上也有发现。

六尊初期金铜佛具有睁眼、八字胡的特

杨华《中国汉传佛像赏析》,《收藏》2008年2期,100-102页。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15页,2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7-9页,2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杨华在同文中还介绍一件“前秦太安三年”(386年)铭文铜佛像,其图像虽与“太康佛”存在差异,但制作风格与其基本相似,可以说是同一时期制作的伪品,不值一驳。见杨华《中国汉传佛像赏析》,《收藏》2008年2期,100-102页。

[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艺术寻踪》,215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李静杰《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考古》1995年5期,463页。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192-222页,“摇钱树佛像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建武坐佛项光不明,但其头后有一棒头,可以推测象无畏印坐佛一样用以插圆形项光,因为,从其后颈到背面有圆弧形阴线衣纹来看,不可能有背光。

点同样来源于摇钱树佛像。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摇钱树干佛像均为八字胡，安县东汉中期摇钱树枝和树干佛像除了八字胡外，双眼圆睁。当然，这种特征最早可上溯到贵霜王朝的初期佛像。

2. 手印。杨泓指出，早期金铜佛“都是把双手拱在胸腹间，手心向内叉合在一起，这样的手式过去认为是禅定印，并不正确。而一般神仙像却都是作这样的手式，看来佛像的手式也是受这种影响，而成为别具风格的特点之一”。杨泓已经观察到佛像双手贴腹与常见的双手相叠放于腿上禅定印的区别。但是，他把这一特征来源归结于神仙像的看法，却未见得正确。东汉以降常见的西王母像一般是袖手，迄今没有发现双手贴腹的神仙像。倒是在鄂州和赤城古坟三世纪后期佛像镜显示了建武坐佛双手贴腹手式的来源。如果加以溯源，双手贴腹的佛像实例在犍陀罗佛像中也有发现，在巴基斯坦萨利·巴路尔(Sahra-Bahlol)出土的一件“太子观耕”石雕，与常见的菩萨双手相叠、平放腿上的禅定印不同的是，该像双手相叠、大指相抵，贴于腹前。

实际上，双手贴腹和平放腿上是犍陀罗菩萨禅定印两种大同小异、略有区别的表现方式。例如，同样是“太子观耕”石雕，白沙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造型与上例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就是双手相叠、平放腿上。“太子观耕”见于西晋竺法护《普曜经》卷三“坐树下观犁品第八”释迦太子“见阎浮树，荫好茂盛，则在彼树，阴凉下坐，一心禅思，三昧正定”。

两件犍陀罗石雕就是表现了太子在树下“一心禅思，三昧正定”禅定的形象。由此说明，早在犍陀罗石雕中，禅定印至少就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并且，这两种图像志粉本大约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时，就被分别忠实地运用在鄂州陶瓷佛像和佛像镜的制作之中，并被我国初期金铜佛所继承。

至于无畏印坐佛手印的源头，同样可以在汉晋佛像中找到。东汉时期佛像均为施无畏印，无畏印坐佛右手较大的手掌，尤其与摇钱树干佛像相似。但是，目前发现的三国时期的佛像几乎全是禅定印，只有重庆忠县涂井蜀汉墓出土摇钱树干佛像施无畏印。所幸的是，日本奈良群马赤城古坟出土三世纪晚期到四世纪初期（相当于三国后期至西晋时期）的佛像镜找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赤城佛像镜有三尊佛像，其中一尊站立，该像虽小，但铸造清晰，头作束发，双眼圆睁，八字胡，穿圆领袈裟，从胸至膝呈现七重长长的U形衣纹，衣袖纹宽大，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托举一莲苞。无畏印坐佛与其睁眼、八字胡、施无畏印、重叠的U形衣纹等诸多特点都很相似，这反映了两者年代的一致性。日本出土的三角缘佛兽镜是三角缘神兽镜的一种，王仲殊认为，它是受到了吴地佛兽镜的影响，这说明了无畏印坐佛与汉晋佛像的渊源关系。

3. 衣纹和坐式。坐佛均为圆领通肩袈裟，无畏印坐佛为U形衣纹，来自鄂州和故宫收藏的三国时期釉陶佛像。U形衣纹最早可上溯至云南昭通东汉晚期陶佛像。其源头在印度迦腻色伽51年纪年秣菟罗佛像，就有衣领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299页，《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173-191页，第八章“论摇钱树西王母图像的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A、丁堂华主编《鄂州铜镜》，139页，图291，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B、郭丽英《中国南北朝以前的佛教造像与江南地区佛教的传入》，《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799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该图见耿剑《步履蹒跚——我的佛教美术研究》210页图3，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

[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艺术寻踪》241页图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192-222页，“摇钱树佛像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郭丽英《中国南北朝以前的佛教造像与江南地区佛教的传入》，《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799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1982年6期，630-639页。不过，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是否王仲殊所指由东渡的吴地工匠制作，尚缺乏文献支持。

何志国《从昭通东汉佛像看我国早期佛像的来源》，《民族艺术》2008年4期，100-105页。

以下呈逐层重叠、均匀的 U 型衣纹。

综上所述，汉晋佛像是初期金铜佛的重要来源。两者非常接近的风格也印证了上述对六尊金铜佛时代为西晋的推断。

除此之外，藤井菩萨和故宫菩萨则具有浓郁的犍陀罗艺术特征，其发式、面型、项饰、裸上身、具有体积感的衣纹，与犍陀罗菩萨非常相似。因此，它们虽然可能出土或铸造在中国北方，但佛像粉本则有可能来自域外。另外，福格坐佛火焰焰，右撇衣纹，衣摆呈菱形，衣纹贴体，具有透视感的特征，也受到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四、余论

文献记载我国最早铸造金铜佛像的年代是汉末。《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载：“笮融者，……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我曾指出，笮融督造佛像的年代是汉献帝初平三年四月（公元 192 年）至初

平四年（公元 193 年）之间。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笮融主持铸造的金铜佛像，但这段文献说明了早在二世纪末汉地铸造金铜佛的事实，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发现 55 尊东汉中期、晚期青铜摇钱树佛像则是实物证据。因此，笮融督造佛像的粉本不排除取自汉地发现的东汉佛像的可能性。降至三国的佛像资料是武汉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263 年）墓出土鎏金铜片镂空立佛像。据梁《高僧传》载，东吴晚期，在吴地发现金铜佛像，吴主孙皓因侮辱佛像而受到报应。至于西晋时期金铜佛的情况，北魏《洛阳伽蓝记》有一则记载，昭仪寺南宜寿里发现“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坐上铭曰：‘晋泰始二年（266 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为西晋金铜佛的出现提供了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初期金铜佛明显受到了汉晋佛像影响，同时，也有直接来自犍陀罗艺术影响。

[日]村田靖子著，金申译《佛像的系谱》45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

（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刘繇传》118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217 页，192-222 页，“摇钱树佛像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

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 1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

（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17 页“译经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北魏）杨衒之撰，韩结根注《洛阳伽蓝记》，51-52 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年。